

试论东晋的建国及其历史地位

杨 德 炳

关于东晋及其在我国历史上地位的问题,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专文论述。一些通史和断代史对此问题虽有所涉及,但由于受通史体裁的限制,未及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系统和充分的论证。有的则过分强调东晋门阀统治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从而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东晋只是一个腐朽不堪的偏安小朝廷而已,无甚历史地位可言。近年来笔者在教学与科研中,逐渐感到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地认识某一事物,就事论事总是不够的,还须把它与同它相关的事物进行比较。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南北对比,上下联系的方法,通过对东晋的建国、东晋门阀统治的基本特点,东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政策及其实施后所取得的历史效果等问题的考察,对东晋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一、阶级矛盾在东晋建国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过去人们讲东晋建国往往只强调民族矛盾而忽略了阶级矛盾这一因素,这显然是欠全面的。我们认为,如果说西晋政权是在阶级、民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集中爆发的烈火中被摧毁的;那么,不是别的,正是这三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东晋政权的诞生。换言之,即西晋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严酷现实,才促使南北大族联合起来共建东晋政权。关于民族矛盾在促进南北大族联合起来共建东晋政权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已作精辟论述,兹不重复。下面考察一下西晋末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从中看看阶级矛盾在促进南北大族联合共建东晋政权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太安二年(303)爆发的张昌、石冰起义,很快就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义的风暴使“孙吴旧壤”的地主阶级深为恐惧,从而开始改变对晋政府的不满与不合作态度。不仅象周玘、顾秘、贺循、华谭、甘卓这样的东南大族都纷纷组织地主武装帮助政府镇压义军,就连“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门陈敏也参加了这一血腥镇压,并都因此而加官进爵,进一步向政府靠拢,从而开始了南北大族联合的先声^①。

永嘉四年(310)和五年(311)相继爆发的关中、巴蜀流民起义,再次在长江中游的荆、湘地区掀起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司马睿派王敦、陶侃、周访、甘卓等前往镇压,当地大族如虞潭、尹虞等也积极投入这一行动^②,南北大族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再次加强了联合。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江、扬二州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晋书》卷71《王鉴传》称:“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赋敛搜夺,周而复始,卒散流人,相望于道”。同卷《熊远传》亦称:“今杜鰲蚁聚湘川(州),比步征行,百姓疲弊。”因此长

江下游的农民也纷纷逃亡或掀起暴动。《晋书》卷58《周处附于玘传》称：

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玘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玘甚有威惠……期年之间，境内宁谧。帝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

周玘自镇压石冰起义之后，与北方大族的关系日益密切。永嘉元年和四年，又先后平定陈敏和钱璠之乱。这时江东地区“盗贼公行”，阶级矛盾再度激化，司马睿自然要格外重用他，而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当然也更乐于效命了。

直到建兴初年，整个江南阶级斗争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晋书》卷68《贺循传》称：

时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席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江道万里，通涉五洲，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或欲使诸县领兵。愚谓令长微弱而兼才难备，发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肃，恐未必为用。以循所闻，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地势险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备戍，随势讨除，绝其根蒂。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微行。……案汉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等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独制者，可指其踪迹，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与军家杂其微备，两情俱堕，莫适任负，故所以徒有备名而不能为益者也。”帝从之。

贺循为会稽大族，在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方面颇有经验。在镇压石冰起义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并不急于靠拢北来大族。但当江东阶级矛盾再度激化，又一次对整个统治阶级构成威胁时，他就完全靠拢以司马睿为首的北来大族集团，为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出谋献策了。他的计谋大致有三：一是不同意诸县领兵以分散兵力；二是在江中剧地“阖庐”设重兵，以便“随势讨除，绝其根蒂”；三是在沿江诸县“多设亭候，恒使微行”，若义军强大，无力镇压时，就“指其踪迹，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可见，这种军事部署，完全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并非是为了“抵抗外侮”。

以上说明，西晋末年由于刘渊、石勒的反晋斗争很快就由正义的反民族压迫战争转化为非正义的民族侵扰战争，民族矛盾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矛盾，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占主要地位的仍为阶级矛盾。因此，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南侵，诚然是促使南北大族联合共建东晋政权的强大动力；然而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晋书》卷六《元帝纪》称：

愍帝即位，加（司马睿）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遣诸将分定江东，斩叛者孙弼于宣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荆扬。……

我们从这段东晋建国过程的概述中，也不难看出，东晋政权是在镇压人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以上是我们对东晋建国原因的基本认识，这对我们认识和评价东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东晋是在当时民族矛盾成为全国范围内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建立的，历史赋予它的首要任务无疑就是有效地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南侵。因此，对于这一首要历史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自然就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主要依据。又由于它是在镇压长江中下游人民反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情况不仅体现了这个政权的阶级本质，且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建立后究竟能有多少新气象，能有多大作为，从而对这个政权历史作用的大小和历史地位的高低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二、东晋门阀统治的本质特点是腐朽无为还是强大和有所作为？与北方五胡政权相比，究竟谁先进一些？

对东晋的门阀制度和门阀统治究竟怎么看？过去人们往往持否定态度。有的教科书认为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门阀制度，至东晋时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东晋王朝是腐朽反动的西晋王朝的继续，这个小朝廷自建立以后，其固有的黑暗、腐朽的特点日益发展。

我们认为东晋既不是直接推翻西晋而建立的，而是在原西晋一个地方政权的基础上创建的，并且同西晋一样都是皇室司马氏与若干门阀的联合统治，从这个意义看它与西晋确有继承关系，可以看作西晋王朝的继续。但是，东晋的建立决不是西晋门阀制度和门阀集团腐朽性、寄生性进一步发展的产物，相反，它是西晋门阀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为之士振作和奋斗所带来的硕果。在西晋行将灭亡的历史转折关头，门阀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急剧分化的。一部分腐朽沉沦不能自拔者终于成了这个王朝的殉葬品，另一部分则从沉沦中振奋起来，或奔赴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最前线，或渡江南下，创建东晋政权。这后一部分人中，刘琨孤守并州、祖逖挥师北伐的壮举诚然可歌可泣；以司马睿、王导为首的南下集团惨淡经营创建东晋政权，从而保住了半壁河山免遭五胡统治者的野蛮蹂躏，这同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东晋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它有效地抵御了五胡统治者南下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东晋的门阀集团决不是比西晋更加腐朽寄生和无为，而是强大和有所作为的。

再就门阀制度本身而论，我们认为这个制度虽然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这是它的剥削阶级本质所带来的消极面。但和历史上其它许多剥削阶级的制度一样，在它的上升阶段（即形成和发展时期），它是有生命力，有进取性，并对历史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消极的一面并不占主导地位。如果说三国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形成时期，那么东晋就是门阀制度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仍然处于上升阶段。首先，我们看到东晋仍是人才辈出的时代，王导、谢安、桓温、谢玄等人个个都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们对祖国历史都曾有过重要贡献。这说明尽管此时门阀制度虽然也具有压制人才的一面，但总的说来它还是能造就和选拔大量优秀人才的。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东晋门阀统治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宽和”二字。《晋书》卷73《庾亮传》称：

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庾）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

同书卷79《谢安传》亦称：

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盖不守，樊邓陷没。（谢）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所谓“宽”，就是“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也就是对南北大族采取“宽惠”甚至“包容”的态度③，并以此来求得门阀集团乃至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和”即团结。史称王导“以宽和得众”，称谢安的“镇以和靖”是“德政既行，文武用命”看来并非夸饰溢美之词，东晋的历史证明，这个政策是基本成功的。当然，我们在分析促进东晋门阀集团内部团结的原因时，不能忽视当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严峻形势也是两个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宽和”政策的执行，这个团结也很难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了也会严重破裂，这一点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即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似乎主要不是依靠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而是通过满足门阀要求和巩固门阀制度来维系的。这是否说明，东晋时门阀制度和门阀集团仍然起着维系整个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凝聚力的作用呢？再次，

东晋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是谁都承认的历史事实。但究其原因，除了北方人民南下客观上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之外，东晋政权和门阀集团所起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能忽视。正是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外抵御了五胡统治者的南侵，对内保持了政局的基本稳定，才为南方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东晋立国后为了加强国力而采取的一些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也对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南北大族广占土地山泽和劳动力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的过程^④。这说明门阀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此时还不是妨碍生产发展的桎梏，而主要起促进作用；门阀地主在江南经济的开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最后，尽管东晋的门阀统治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弊病，但如果把它与北方五胡政权的统治相比，就不难看出它要先进和优越得多。关于北方五胡政权的统治情况，唐长孺师在《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中早已作过详细论述^⑤。在五胡政权建立之前的军事征服过程中，大规模的屠杀、掠夺和强制迁徙以及对中原经济的严重破坏等等在此就不用多说了；五胡政权建立后的统治也带有鲜明的野蛮性和落后性。汉和前后赵实行的胡汉分治，使汉族人民头上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要加上一层野蛮沉重的民族压迫，石虎的“苦役晋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至于五胡政权普遍实行的以军营统户和以军镇统户，更是一种军事封建制。在这种制度下，广大汉族人民被沦为“营户”、“镇户”、“军封”和“杂户”，他们在赤裸裸的军事管制下，其处境要比东晋的佃客和隐户更为悲惨，身份也更为低下。可见，五胡政权虽然没有实行门阀统治，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们实行的是一种比门阀统治更为进步和优越的统治，相反它们的统治较之东晋的门阀统治显得更为野蛮和落后。如果说东晋的门阀统治还是魏晋以来封建统治常轨的沿袭，那么五胡政权实行的胡汉分治和军事封建制就意味着对这个常轨的偏离甚至倒退。

三、对东晋的偏安与北伐、王权弱小与门阀强大以及东晋的国力等问题的一点再思考

一提到东晋，人们总是习惯地把它与“偏安”二字联在一起。其实历史上凡偏安的王朝结果总是偏而不安，卖国投降，南宋就是一个典型。但东晋则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北方五胡统治者的南侵，而且多次挥师北伐；终东晋之世既未放弃过北伐这面旗帜，也没有出现过任何“议和派”和“投降派”。可见把“偏安”这顶帽子戴在东晋头上恐怕未必适合。东晋虽从未放弃过北伐这面旗帜，但在对待北伐问题上却确乎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不过其中情况十分复杂，须作具体分析，不好一概而论。如晋元帝对待北伐的态度就十分微妙和复杂。一方面在创建东晋的过程中他确实因忙于“拓定江南”而“未遑北伐”^⑥，但另一方面他毕竟又答应了祖逖的北伐要求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因此，我们在对祖逖的北伐壮举大力赞扬的同时，对晋元帝也不必作过多的指责。再如东晋统治者对待北伐的态度和作法上之所以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分歧，有的是因为牵涉到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关系，有的则是出于对形势的不同认识。对于这些具体问题，在此就不准备一一详论了。总之，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彼此都无力消灭对方，统一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东晋对北伐不采取全力以赴而采取以攻为守的慎重方针，这不仅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是明智的。应当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因统治集团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相互猜忌和牵制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使北伐力量受到削弱，甚至直接导致北伐的失败。

东晋王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王权弱小和门阀强大，先后由王、庾、桓、谢四家大族当权，不仅是“王与马，共天下”，而且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已有众多论述，在此只想提出两点探索性的不同看法：一、王权弱小并不等于整个政权的力量就弱小，因为拥兵自重的门阀势力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都尚未发展到藩镇割据的地步；荆州之于扬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但更多的还是起着屏障作用；“共”天下仍是主流，“争”天下只是个别的特殊现象，且为整个门阀集团所不容。因此，总的看来，这些强大的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门阀势力，不但没有脱离这个政权，相反还是支撑这个政权的重要柱石。二、王权强大不一定都是好事，因为它往往会把一切都统得过死，从而扼杀统治阶级内部和各地地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且王权发展到了极点之日，也往往就是暴君暴政肆虐之时，从而将整个社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门阀强大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以东晋时门阀势力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论，就不能持简单的全面否定的态度。因为这种独立性既给整个政权带来分散性的消极作用，但又正是这种独立性给门阀势力带来一定程度的主动性和进取性。庾氏、桓氏对荆州的锐意开发，谢氏对北府兵的苦心经营，不正是这种主动性和进取性的体现么？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后世的笑柄，难道“共”天下就毫无可取之处吗？难道门阀与皇帝分点权，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起一点制约作用就那么不好和可笑吗？当然这样说并不是给门阀和门阀制度唱颂歌，而只是为了对这些多年来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一点新的探讨。

关于东晋的国力问题，我们认为要准确无误地用数学的办法来计算出东晋的国力简直是办不到的。但如果把从各个侧面所能提供的情况汇集起来加以比较和分析，如把东晋同孙吴以及北方五胡政权进行比较等等，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大致性、倾向性的评估。

与孙吴相比，东晋虽然是在“孙吴旧壤”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其面积毕竟要比孙吴大一些，再加上北方人民不断南下，给南方增加大量劳动力等等条件，就使得东晋对南方的开发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看都要超过孙吴时期，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在孙吴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南北战争形势看，孙吴时几乎完全处于守势，东晋则以攻为守，多次北伐；而东晋之所以能这样，强烈的民族意识诚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一定社会经济力量作后盾，恐怕也是办不到的。这说明东晋的国力要比孙吴时期有所发展和壮大。

与北方五胡政权相比，除后赵、前秦外，其它政权都不足一论。石勒在进据襄国以前，所率完全是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军事掠夺集团。建立政权后，虽经过石勒的努力，社会经济也只达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可是到石虎时期，全国几乎成了一个大兵营，劳役繁兴，干戈不息，无休止的苛重的兵役力役征发将人民推入绝境，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摧残。因此，穷兵黩武非但不表明后赵国力的强大，相反正是这种自毁国力的暴政导致了后赵的迅速灭亡。

前秦经苻坚、王猛之锐意经营，不但统一了北方，而且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五胡之盛，莫之比也”^⑦。因此，十六国时期只有前秦的国力超过了东晋并成为东晋的最大威胁。然而，淝水一战，不但苻坚“混一合六”的愿望顿成泡影，而且身死国灭，貽笑后世，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更大的分裂局面，这又是为什么呢？关于前秦败亡的原因，史学界颇多论述，此处仅补充两点。一是苻坚根本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正视当时南北之间的民族矛盾仍占主导地位这一严峻现实。前秦虽未实行胡汉分治，也推行过一些汉化政策，然而远没有完成汉化的历史进程。而苻坚却企图超越这一历史进程，硬把自己打扮成秦始皇、晋武帝式的人物，但在南北人民特别是南方人民的眼里，他仍然是个五胡之君。尽管他竭力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天经地义的统一大业，但这也并不能改变或掩盖这场战争的民族征服性质，他的赫

赫“王师”，在东晋军民看来仍然是和石勒等没有什么区别的“胡骑”。其实这个问题王猛在临终前就已向他提醒过，但此时他与其说是忘记了还不如说是有意回避。正因为这是苻坚有意回避的要害问题，故群臣在进谏中虽列举了许多东晋不可伐的理由，而唯独对此讳莫如深，只有他最亲信的季弟苻融才敢提及这个问题。《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苻融传》称：

坚既有意荆扬……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

王猛只说了“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这一面，苻融又加上了“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的另一面，算是把问题都说穿了。苻坚对此何尝又不清楚，但他仍然不愿予以正视。这样苻坚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即不仅过低估计了东晋的国力和兵力，而且完全忽视了东晋军民基于强烈的汉民族意识所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亦即军心民心的力量。但是，苻坚可以不正视现实，却无法逃避现实，要来的终会要来。《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称：

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恍然有惧色。

身经百战、统兵百万的一时雄杰苻坚，为什么竟被区区8万晋军吓得草木皆兵，脸露惧色？这是因为他从刘牢之的洛涧大捷，从晋军齐整的部阵和高昂的士气上看到他所不愿承认、不肯正视的东西——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和抗击外侮的坚强决心所激发出的一种可怕的战斗力。正是这种可怕的力量使得他的精神受到震惊，开始崩溃。苻坚如此，将士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故以后的不战而溃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前秦的国力虽比东晋强大一些，但苻坚的这种“倾率土之师”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行为，不仅会带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等严重弱点，而且也远远超过了其国力所能承受的负荷，故本身就是一种自毁国力的暴政。因此，只要一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兵败于外，资竭于内，覆灭的命运就为期不远了。

东晋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与前秦相比，虽然东晋的国力要弱一些，但由于它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民族保卫战争，举国上下空前团结，民心归向，士气高涨；又由于在用兵上不单纯追求数量，而是依靠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和西府兵，这样就不仅弥补了国力不足的弱点，而且使国力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总之，东晋的国力不但比孙吴时期有所发展和壮大，而且与十六国时期的五胡政权相比，总的看来也是强大的。

以上我们对东晋的建国、东晋门阀统治的本质特点以及东晋的偏安与北伐、王权弱小与门阀强大和东晋国力的强弱等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基本上是肯定性的看法。但这决不说东晋就没有弊病和不足之处，只是认为这些消极的东西和阴暗面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已。东晋实行的是门阀统治，而门阀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一定程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因此东晋的门阀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王导的“宽和”政策虽然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这个政策并不能完全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终东晋之世，南北大族之间，南下大族之间的矛盾不但始终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还激化为内乱。在北伐问题上，东晋虽从未放弃过这面旗帜，但由于统治集团的派别之争，也使北伐力量受到牵制和削弱，并且还错过了许多有利时机。特别是东晋创建过程中，荆湘地区虽爆发过流民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以后扬州地区阶级矛盾虽十分尖锐，但在统治阶级的高压下，并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使统治者受到巨大的打击和震动。因此，东晋建立后并没有认真实行过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等措施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王导的“宽和”政策，说到底还是以牺牲

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求得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当然，这样作有利于抵御北方五胡统治者的南侵，是符合民族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从这个角度看，应当予以肯定，但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则不仅不能肯定，而且是应持批判态度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的看来是中国历史上由两汉至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性时期。它本身又可分为三国西晋和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导致分裂的原因较为单一，魏蜀吴仅为地区性分裂，彼此区别不大，故当地处中原的魏国力量超过吴蜀之后，统一就指日可待了。后一阶段则因五胡的入主中原而使情况大为复杂，南北之间的对峙不仅表现为地区性的分裂，而且带有鲜明的民族对立的性质。历史的长河至此一分为二，南北二流各按自身的特点奔流前进，直到隋唐时才重新汇合成为更加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

就十六国北朝而论，上文提到过由于五胡的入主中原是比较原始落后的边境少数民族对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军事征服，故不仅在征服过程中表现为空前野蛮的掠夺与破坏，而且在政权建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又是胡汉分治和军事封建制等野蛮落后的统治。这就使得中原地区的历史越出了魏晋以来的常轨，出现了曲折、回旋甚至暂时的倒退。只有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之后，这种野蛮的破坏性才能得到克服，巨大的建设性才能得到发挥，战乱分裂的因素才能转化为更为强大的统一的动力。而东晋南朝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首先，东晋释立的过程，不仅没有给江南带来任何破坏，相反，正是由于它的建立才有效地抵御了北方五胡统治者的南侵，从而使江南免遭野蛮蹂躏。其次，由于江南的经济文化本来就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而北方流民（包括大族和人民）的大量南下，不但给江南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因此，东晋的建立不但为南北人民共同开发江南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而且将江南经济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北方相比，历史的发展在这里不但没有出现曲折或倒退，相反是以更快的速度向新的汇合点奔涌前进。范文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精辟指出：“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籍”^⑥。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源头是由东晋而开，基础也是由东晋而奠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东晋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作出特殊贡献的朝代，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 ① 见《晋书》卷68《贺循传》、卷76《虞潭传》、卷52《华谭传》、卷70《甘卓传》、卷100《陈敏传》。
- ② 见《晋书》卷76《虞潭传》、卷96《列女·虞潭母孙氏传》、《列女·尹虞二女传》。
- ③ 见《晋书》卷73《庾亮附弟二水传》、卷65《王导传》。
- ④ 请参看唐长孺先生《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 ⑤ 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 ⑥ 见《晋书》卷68《祖逖传》
- ⑦ 见《晋书》卷115史臣曰
- ⑧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452页。